

锁阳城遗址考察记

刘兴义

(酒泉市博物馆,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1982年9月28日,笔者所在酒泉县博物馆应邀参加了对今瓜州县境内锁阳城遗址的初步考察。本文主要结合考察实践,简要介绍了锁阳城遗址的地形地貌、遗址保存现状、发现遗物、周边墓葬等,并就其中相关问题作了辨析。

[关键词]瓜州;锁阳城遗址;古墓群;黑水河;苦峪城

[中图分类号]K92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15-05

一、去锁阳城沿途简记

笔者所在考察组一行乘汽车离开瓜州县城,驶入安(西)踏(实)公路,南行10公里,经十工地方,略向东南数里,便进入乱山丛中(这是三危山向东北伸延的余脉),经过一段低矮的小山群,约15公里出山,进入戈壁,又东南跨过一段低凹的黄水沟沼泽,约14公里到破城子大队,树阴葱浓,田畴连绵,顿觉有世外之感。破城子名不虚传,确有一座破城垣,坐落于公路东侧,为一南北长方形小城,四面皆有马面,据传是汉代敦煌郡广至县城,晋时属晋昌郡所辖,唐改为常乐县;宋陷于西夏,城废。由破城子起公路折而向东。但由此向南却另分出一条简易支线,约30公里,可通河西第二艺术宝库——榆林窟(俗名“万佛峡”)。汽车向东约4公里穿过踏实堡(该堡建于清雍正六年,据考证约为晋之凉兴郡故址)折而东北行,跨过一片平阔的盐碱草原,50余里即到桥子公社。“桥子”距瓜州县城63公里,此地以前地名普查中,有老年人说原名叫“黑水”,先年有城,俗称堡子城,城南有一条宽阔的芦苇荡,东接干河坝,西连芦水沟,今俗称黄水沟,其上有桥,名曰“黑水桥”,后人简称为桥子,原来这里是古代黑水古道流经之地,故称“黑水桥”。而地名普查中,有人认为老年人所称黑水桥的名字没有历史根据,便予以否定了。但《肃州志·靖逆卫》中却记载着黑水河“在卫(玉门镇)西南90里,西至踏实60里,西南至旱峡50里,南至上达尔兔(即锁阳城)20里,水色微黑,有鱼,发源于东沙窝,西流入芦水沟”。此段记载与实地踏勘基本确凿,证实了命名为“黑水堡”、“黑水桥”都是有历史根据的。锁阳城屹立在黑水河南岸不远处。

二、锁阳城附近的地形地貌

由桥子公社南行约9.5公里即到锁阳城。这是距瓜州县城东南72公里(直径约50公里)的荒漠中的一座古城。城西部和北部是由西南略向东北倾斜的低矮沙丘地带,南北宽约2公里,向东北延长达10余公里,中间还跨

越了一条古河床。沙丘上遍生着柽柳(红柳)、白刺、芨芨草和骆驼刺等耐旱性野生植物,其间,还盛产锁阳(一种中药材),故名锁阳城。城的南部则是由西南方引伸而来的,破碎的风蚀黄土残丘,南北宽约3公里,经城南再向东北延展,长约8公里,东部为古河道由东南向西北冲断。河道两边被洪水冲刷黄土崖岸,至今还依然存在,河底悉为黑色细砂与沉积的白色胶泥形成无限鳞波起伏。河床在此处(东戈壁)分为三大岔,北边一岔较为狭窄(宽约40米),中流最为平阔,南边一岔宽150~200米。由此情状可以臆想在古代此河水势是十分激荡猛烈的。在黄土丘陵之南,便是沿山一带的砂砾戈壁滩。锁阳城就建筑在风蚀黄土残丘带的北缘与北部细沙丘陵带南缘之间。在黄土残丘带中,因极度干旱,野生植物十分稀少,间或有几株稀疏的骆驼刺。土丘高度一般为1~2米,最高可达3米。站在高阜向南遥望,密密麻麻的黄土丘,如塔、如柱、如棺、如屋,几疑为千家万户,屋舍俨然。其底层即为黑色砂砾,很少有大石出现。由观察得出一个概念:在古代,这里本是一片肥美的黄土平原,大约自河流断水之后,人民弃地徙走,黄土层被风沙侵蚀为残丘,其北部的细沙丘陵,实为地面植物的阻风力,经数百年的积聚而形成的。

三、锁阳城的城垣建筑

在现存河西古代城堡遗址中,锁阳城算是规模比较宏大的一座古城,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城基本上属于南城的外围,为长方形,目测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约200米,惟北墙中段有路相通,似为原城门之所在。东北角向内折,西部宽,东部窄,每角都有角墩,但无马面。北城结构不如南城之雄伟高大,墙基广约3米,残高4~5米不等,已完全残颓,无雉堞可见,墙之间断,倾倒部分约占全城1/3,悉为夯土夯筑。西南一角墙垣尚存,但外部为沙丘所欺,南墙中段似为大水所冲毁,城内平旷,已无任何建筑遗迹可辨。现据残破倾圮之状,估约为唐初所筑,而当地群众则称其为锁阳城之关,其东

墙向南延伸至南大城东墙之外,相距约10丈,墙之南、北两端各筑有巨大的土墩形若关隘。北城外西北角不远处有孤立的两座小堡,形如空心墩,四面无门,当地群众大都传说是古代的牢狱,因限于时间,惜未能近前细察。

南城大致为正方形,建筑造型高大雄伟,有突出的军事特点;南北长470米,东西宽430米,墙基宽厚,估约6米许,残高8~9米,顶面残宽3~4米不等,雉堞倾圮无存。惟城中南北又筑一道隔墙,将南大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略大。其隔墙东侧筑有5个马面,大致等距。墙中段似有门,但现在只能见到倾倒的土壑口。大城外面,除四角有巨大的角墩之外,南墙有5个马面(加角墩共7个),东、西城墙各有四个马面,北墙东、西两端距角墩20米以内,各筑一个瓮城,突出之北墙之外,瓮城之门均向内开,墙的结构规格均与大城墙筑法相同,北墙仅有两个马面,俱靠近东、西两个瓮城,中间距离较长。大城只有西墙和北墙有城门,北门略偏东,西门偏南,南北两墙比较完整,东墙虽有几段倾倒,但无城门迹象。城的西南角由南向北约有10米的内折角,折角之东,连带一个瓮城,城门也向内开,观其功用,实为军事防守设施,并非出入之门。在东半城的东北角,又套筑了一个小城,面积还不到东半城的1/5,墙已倾倒残缺,墩基尚存,这是一个内城中的内城,大约为长宫或守将的驻所。大城四面城墙上部一概无城楼建筑踪迹,只有西北角墩之上,又用土块砌成一个高大的瞭望墩,高5米,连城墙总高约15米。中间砌有可以东西穿行的土门一洞,高约3米,宽1米,进深总约5米(残深仅3米多)。登城入门,可以远眺城西之敌情,方圆十里尽收眼底。按此土坯筑成的瞭望墩,疑为唐开元中所补筑,似与旧城不同。南大城的北墙,叠筑于北城南墙东段的基础上。东墙和南墙的外围相距约在5丈远的地方,又筑起低矮的外围墙一道,西端勾连于西南角墩,东面北端勾连于东北角墩,但均已为残迹,因墙垣薄矮,土质多沙,似为后期所补筑,反不如古城墙之雄厚耐久。在东城墙北段之外约10丈远的地方,另有一道雄厚的大墙,是北城之东墙向南延伸的部分,此墙南、北两端各有一相连的土墩,形成包围东北城角的转折巷道,颇似关隘。据唐《元和郡县志》,东迁后的“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则是唐代玉门关址无误。既有玉门关的建筑,而城与关的土质相同,成色相同,筑法亦同,以此推断,锁阳城的建造年代,最迟不下于唐初。大城西部外围200多米处,另有一道曲折的围墙迹象,仅存片段,淹没于沙丘之中。大城城墙顶部,有后期补筑遗迹,尤以西城墙和南城墙最为明显。视其做法:先在残墙顶上铺压一层红柳、刺条等物,然后铺筑一二层夯土,如此反复数层,与古城原先之夯层有明显不同。而且在补筑之土层中夹杂有许多汉代陶片与砖、石之类,今据《新唐书·列传第五十八·王君毳张守珪

传》记述,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以瓜州常乐人王君毳(今踏实破城子人)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开元十四年(726),吐蕃大举寇瓜州,王君毳率军追奔青海湖上,大破吐蕃兵。不久,吐蕃又以10万之众改陷瓜州(即锁阳城),掳去了瓜州刺史田元庆和王君毳的父亲王为,杀居民夺粮饷,并毁坏瓜州城垣而去。会其时,回纥等四部酋长与君毳构怨,回纥酋长承宗的党羽——韩海州司马名曰护轼,图谋报复,因潜埋伏兵于张掖路上,君毳正由肃州返张掖,被伏兵拦截遇害。君毳既死,“玄宗甚怜之,又以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守珪率众修城,方施工,吐蕃又至,守珪置酒城头,与众吏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珪纵兵击之,虏败走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民,皆复故业”。朝廷乃升守珪为瓜州都督,设瓜州都督府。据此段记载,表明瓜州城在开元前原已有之,今见城头补筑之遗迹尚存,其必为张守珪所补无疑。城东北角之内城,约即为瓜州最高统帅府衙之所在。

锁阳城城内地面极为不平,分布着10多个馒头形土丘,排列紊乱无序,大部分土丘顶上荆棘丛生,少数土丘上面有用草皮筏子砌成的圆形小屋和土筑长方形屋,为时已不下数百年。土丘与土丘之间,南半城多为风积流沙;北半城地势较低,则形成盐渍土、坑凹地。西北部尚有水井一眼,已干涸填实。丝毫见不到古城内原有之建筑物遗址。这些迹象有可能是宋、元以来吐蕃或蒙古人居住的象征,最迟也应为明弘治中徙来哈密流民活动的痕迹。据《明史·西域传》记载,弘治中(1488~1505),吐鲁番苏坦阿黑麻攻占哈密,哈密人民不能支,大批维吾尔、哈喇灰和回族人纷纷迁徙肃州。肃州官员以官诏赐给牛具、谷种,复迁其三种人及哈密寄居赤斤者,一并安置于苦峪城及瓜州、沙州等地。此处所说之苦峪城,并非指锁阳城。按《明史》所载:“自赤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城,由苦峪南折而西至瓜州。”《肃州志》:“苦峪在废瓜州东,距肃州四百里。”除安置于苦峪城,瓜州亦曾安置了关外及哈密流民。城内土丘、圆屋等,疑或为此时所筑,实非唐人建筑之原貌。

总之,锁阳城的城垣建造年代史书无从查考,估计最早当在西晋元康(291~299)之后,初建晋昌郡,创筑此城,至迟不下于唐初初置瓜州之时。而城址的选择,或即为汉代冥安县旧墟。开元中(713~741)为吐蕃所毁,张守珪复行补筑,唐末陷于吐蕃,宋景祐中始废。待至明季,此处早已为荒城,无复建城的必要。故锁阳城绝非明季所造。

四、锁阳城遗址的地面遗物

在锁阳城的东郊和南郊各约1里的范围内,在风蚀黄土残丘的空隙间,散布着大量的汉晋陶片。残片上常出现有直径约三四毫米的小圆孔,或在底边,或在口沿下,可能是用作酿醋,或携以绳索,便于行走携带之用。在陶片散布区域中,间或也能拣到“五铢”或“开元通宝”钱币、

玛瑙小珠、陶纺轮、石棋子等；东郊还发现有汉晋石磨、石臼、石钻等残破石器，与汉陶片交混在一起。在城东约5公里处的古河道南岸还发现一处塌陷的土堆，类似陶窑，东、西各有一漫道，周围散布有成堆的碎陶片与炉渣。由此往西约1公里许，地名曰南岔大坑（实位于锁阳城东北约5公里多），地势较低，有千百年洪流淤积的白胶泥，分裂成网状，裂口深达1米多；地面遍生红柳和骆驼刺，大坑中有一小城，略呈长方，占地约10亩许。北部城墙多半为大河洪水所淹没，南墙犹存，尚可登临，城下遗有汉砖碎块，估约为汉代所筑，是否为初期冥安县城，或是都尉驻守之城，尚待释考。

锁阳城遗址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在城南汉陶散布区域的黄土残丘中间，这里埋藏着许多造型大致相同的土穴，有些已经塌陷，其形制大都平底、弧顶，宽约1米、长约0.2米的长方圆形平底。四壁无棱角，在高约40厘米以上便急切内收，构成穹窿顶，而又极像面包。穴内中心高约1.5米，上部全为弧形，仅能容二人坐卧，多数土穴均空无一物，亦无陶片，极少数穴内有尸骨，初疑为土圹墓，后又在个别土穴发现有挖掘得很好的洞门，门宽约60厘米，高可弯腰钻入。门边上还挖有2厘米深的二重台，似可以镶嵌席笆，用以挡风。又在另一洞穴四壁和顶部发现有久经烟火烧烤的黑色烟霉，厚7~8毫米。至此，笔者开始改变了原来认为是墓穴的看法，认定是中世纪部族居住过的土穴。因土穴中无一点残留遗物，说明该民族的经济生活十分贫困，但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为何种民族所居。就土穴造型近似穹窿，以其地历史推论，很可能是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吐蕃人长期占据瓜州所营之住穴。再视其造穴时代而论，其洞门多开于风蚀残丘的立壁上，说明原来的黄土平原和农耕地早已荒废，黄土层早已风蚀残破之后，始建此洞穴。因此，它的建造时代应在瓜州田园荒废之后，必为唐末五代或其以后，不会很早，但也绝不是汉族人所营造。

据《宋史》记载，北宋天圣元年（1023），西夏李元昊袭回鹘、取甘州。天圣八年（1030），瓜州吐蕃王率千骑投降元昊。景祐二年（1035），李元昊与唃廝囉的部将安子罗争夺河西西部三州，安子罗劫断李元昊的归路，元昊昼夜角战200余日，安子罗败，元昊遂夺取了瓜、沙、肃三州。

以上历史事件说明瓜州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年，一直是在吐蕃势力的控制之下。因而，这些土穴与吐蕃人的生活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肃州志》“唃末部”条下云：“唃末部者，吐蕃奴部也。”即唃廝囉所属下层贫苦牧民，散居于瓜、沙、肃等州。说明他们生活比较贫苦。

五、遭劫后的塔尔寺

由锁阳城东北角墩（即唐玉门关）一直东行约千米，

平砂碛中有一座寺院遗址，当地人称其为塔尔寺。四围有土筑围墙残迹，寺门面南，门内左、右土墩各一，残高丈余，两墩之间又有一方形基座，面积估约20平方米，其上已不能辨识原先为何种建筑，惟断砖残瓦堆积为梯形土台，其中尚有绿色玻璃瓦残片。瓦堆之北，即为寺院中心，有一方形土台，高约1丈，边长不足3丈，四边已颓圮为土坡，土台之上建有大塔一座，残高10余米。塔底直径估约7米多，全用土坯砌成，白灰粉面。视其形制，估约为宋、元时代所建，方中有圆，折角层出，十分雄伟壮观。大塔北面又有东西排列的7座小塔。两端之南面又各有一座，共为9座。构成“一”字形，均高丈余，多已残破。可惜大塔中腰西南正中中部被盗者掘开一高可容人之土门，塔内空无一物，塔顶也被盗者揭破。询之64岁的向导聂发刚老人，他说在他10岁那年前后（按指民国十六七年），有两个俄国人偷挖了这座塔。他亲自看见他们揭去了塔顶，内藏大量经卷，全被俄人装了几十箱，用骆驼驮走了。未拿完的，被风吹散于地，整本、残页四处飘零。笔者听后，十分惋惜，但已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挽救。此后，此塔遂荒凉寂寞，残破不堪。

六、锁阳城附近发现大面积古墓群

由桥子公社沿黑水河故道东南行，须经沙田与黄土田地，一路上，红柳滩、白刺、骆驼刺、芨芨草，形成一个个大群落。约行15公里，来到了锁阳城东部的大戈壁，当地称之为“东戈壁”，距锁阳城9~13公里，古黑水河床在此处分三大岔。笔者所走中间的大河岔，是一片宽阔的黑色砂砾滩，在长、宽各约5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无数隆起的黑色沙堆，大小虽不同，但数量很大，粗估也有100多座。亲临一看，才知是一处庞大的古代墓群。各个封土堆都有显著的墓道沙梁，有些则因地面黄土被洪水冲去，墓道竟高出地面达1.5米左右，墓道长度以7~10米者为最常见，也有10米以上的，方向多为西向或南向，往往有三个堆并排为一组者，较为普遍。其最东部封土堆甚大，群众称其地为“唐将七十二座连营”，据传为唐人调兵遣将之台。这大约是受唐人“征西”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传说，实则全为古墓群。有些还有坟埂相连，可惜的是被盗墓者挖掘过，堆顶均有盗坑，在附近30多座墓的盗口上，笔者仅捡到两块汉陶片。这里可暂定名为“黑水河墓群”，初估为汉晋墓群。

另一处在锁阳城南约3公里外的沿山戈壁滩上，可定名为“锁阳城南戈壁墓群”。这个墓群东西长约25公里，西自踏实农场正南，东至锁阳城东南的古代分水房，墓群大致沿东西大车道两侧，宽约3公里不等，初估约有200多座。因时间有限，惜未能亲临一见，只好容后待察。

以上两个墓群，除应及时建立保护标志、向群众宣传保护外，当务之急，应立即制止当地群众在墓堆上挖沙

(有些已被挖去),以保留墓堆位置。

七、关于锁阳城与古黑水河的历史辨析

经过此次初步考察,笔者发现锁阳城坐落在一条古代大河床的西南岸上,城之东北距干河床的最近处约有5公里,大河之流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至锁阳城东北偏北部,地下潜流横生,大河由干砂河床至此变为泉水河床,水草繁茂,河身向西北进入桥子公社境内,继续西流而去。为了考察锁阳城的历史,有必要先弄清古河床的来历。

(一)黑水古道觅踪

锁阳城的古河床,西北进入桥子公社境内,桥子公社在锁阳城正北9.5公里处。笔者向当地群众询问此地为什么叫桥子,以往的旧地名是什么。当地群众说,桥子原名黑水桥,桥北有城堡,俗称堡子城,实则古名黑水堡。今据《肃州志·柳河册》云:“黑水远在(柳沟)卫西南九十里,西至踏实(堡)六十里,西南至旱峡五十里,南至上达尔兔(即锁阳城)二十里,水色微黑,有鱼,发源于东沙窝,西流入芦水沟。”此段所言四至道里,无不与黑水桥吻合,因而芦水沟即今之黄水沟。实即古代之黑水河《禹贡》所谓“导黑水至于三危”者是也。至今,河床宽阔,塞草满生,源远流长,地貌虽因河水断流而起变化,但古代大河床的地形地势却俨然存在。

《禹贡》所说的黑水,并非指弱水上源的张掖黑河,而是指全长600公里的疏勒河的全程。原来,疏勒河的上游300公里即是古黑水的本源,它源起于酒泉以南的青海省托来南山与疏勒南山两大山之间的苏日喀多尔峡谷中,西北流20公里至波罗沟,折而北行,穿过托来南山,经祁连山的柳沟峡,西北入昌马(即古之晋昌郡新乡县地)再汇纳昌马河,出水峡口至大坝庙,至此已300公里,全辗转于高山峡谷中,山地河床较高,水流湍急。由昌马出山后,最早的黑水故道仍向西北直流而下(即山口洪积扇最西边的古河道),坡度骤降,地势渐低,经锁阳城东部,河道略向北弯,至黑水桥,与地下潜流汇合,西北流经踏实堡(此处为晋之凉兴郡故地),北13公里处,再向西经破城子北。西流20公里纳营盘泉、三个泉等泉水,由营盘泉以西,地势更低(即由黑水桥的海拔1400多米至此降至1200多米),河床也显得更宽阔,由此转向西北。穿越三危山余脉(小火焰山与截山子),经芦草沟,入于沙漠。此沙漠今俗称西沙窝,在安西县城西南。据吴乃骧同志考证,实为秦汉时期的鱼泽,东西长约20余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不等。黑水注入鱼泽,再由鱼泽向西泻出,经西湖南部的大坑地带,西流纳党河尾,注于哈拉脑尔(即黑海子),笔者认为,以上线路是最古的黑水河床所在,芦水沟就是黑水河的下游河床。《禹贡》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乍看似不可信,今见古河床至芦草井子一段,为三危山向东北延伸之余脉夹峙,黑水河道则由东南向西

北穿过山口(此处疑即大禹所凿之处),由此推断,禹“导黑水至于三危”之语,确凿无误,无可怀疑。至于《禹贡》所谓“入于南海”实为河西地方海之古代称呼,以古代西北民族常活动于大漠南北,古人以此海在大漠之南故称南海,实即指哈拉若尔,汉名黑海子,并非今日中国之大南海。明清时期有论者说,禹导黑水,非指河西黑水,而指为由三川入云南而注于大南海之另一黑水。古人又多惯于引经据典,而往往缺乏实际了解,每有人提到禹贡黑水,必以典籍中所记载的弱水上源的张掖黑河代替,皆称黑水发源于山。实则常将黑水与弱水混为一谈,结果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认为河西无西流之黑水,更不相信黑水可以穿过三危。笔者认为此论大谬,是不知酒泉、敦煌间早就有黑水河之存在。《禹贡》将黑水与弱水相提并论,意即在于此二水均在河西,相距不远,并明言“导黑水至于三危”,又怎能入于中国之大南海呢?

(二)黑水河(疏勒河下游)的变迁

《禹贡》言黑水,说明夏、商、周时代已有黑水河之名。秦汉之世,典籍中不见黑水,而有南籍端水或冥水之称。应劭曰:“冥安,冥水出,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汉志》“冥安县”注:“师古曰:‘南籍端中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二说均“言入其泽”、“溉民田”,可知籍端水即冥水。《太平寰宇记》亦曰:“籍端水一名冥水。”其泽即冥泽。《庄子逍遥游》曰:“冥海之说。”《海内十州记》云:“圆海,水色黑,而谓之冥海。”由此推理,冥水即黑水,锁阳城附近的黑水河就是汉代冥安县的冥水,实为一水多名。据今详查地形,黑水河向西北流,先入于古之鱼泽,由鱼泽西流始能入于哈拉若尔。《元和志》云:“冥安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据此看来,所谓大泽即东起安西芦草沟以西的鱼泽,西至敦煌西北的哈拉若尔,全长260里,即曰冥泽。鱼泽因产鱼,俗名鱼儿海,即大泽之东部一带。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自魏晋以至隋唐时代的冥泽,是在晋昌(冥安县)东北60公里以东地带(按即玉门镇北部境内),西自蘑菇滩,东至八墩,包括饮马农场、黄花农场全境,与汉代的冥泽方位适得其反,岂不矛盾?在这里,笔者认为并不矛盾,因为其中明显地存在着冥水变迁的问题。到了唐代,冥水早已多次向东改道,而由昌马直向北流,即所谓十道沟、九道沟,而流入东部的另一大泽,亦名曰冥泽。

原来,黑水河也和河西其他河流一样,由于受祁连山融雪影响,四季水量不定,夏秋水大,冬春水小。山间河床较高,当其从玉门昌马出山,地势急剧下降,经过千百年的冲刷,上源的山间河床越冲越深,而山口坡脚则淤积成40公里长的洪积扇面,秋冬水小,淤积更多。原先最早的黑水河道(在洪积扇最西边)遂逐渐被淤塞,洪水涨大时,

便向东部较低洼处决口改道,另冲出一条河床来,天长地久,如此反复东移,便形成三角扇面形的17条大沟。最西边的三道河岔,由锁阳城东北部经桥子南、桥子北,均可纳入黑水河,笔者认为此段大约属于夏商周时代的古黑水。其东又有四道干河,向西北方向散入戈壁,遇到特大水量,可汇入双塔的兔胡芦河,北流入于乱山子以北的疏勒河。由此时起,黑水不再穿过三危山余脉,而乱山子以南的黑水河故道及西部的鱼泽,大约即已开始断流,渐趋于干涸。唐代大诗人岑参西行,即有“胡芦河上泪沾巾”之句,而未言疏勒河,大约此时期的黑水即以胡芦河为主河道。后来,山口河道又淤积塞实,再向东决口形成洪积扇东半部的十道大沟,后世统称之为十道沟。其中以九道沟黑水与四道沟黑水经流时间最长,这便是宋、元、明时期的黑水主道,仍称冥水。及至明末清初,四道沟成了疏勒河的主河道。《肃州志》记述疏勒河云:“苏勒河,在靖逆(今玉门镇)东南。其发源在靖逆(东南)五百二十里,西北流与昌马河汇,又北流入昌马河口旧道,直趋四道柳沟。过桥弯而西,汇诸沟而达于党河之尾,归于哈拉脑尔。”九道沟从此干涸。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部疆土初定,于是在疏勒河域移民垦荒,充实西路,筑靖逆卫城(即今玉门镇城),始闭昌马河口,开凿了疏勒河新道。逼水东流,分为东、西二渠,向北又通过已经干涸的东冥泽,将河道向西引入原有的四道沟尾,灌溉了新垦田地,并招民居住。从此,四道柳沟之水遂断绝。这就是今日的疏勒河,是由大坝庙转向东北,复折而西行开凿经过。

古代黑水河逐渐演化变迁,向东迁移形成今日的疏勒河,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其河上游虽出一源,而出山后的下游河床,实非在一地。昔日的黑水河位于乱山子以南,穿三危而西,今之疏勒河则绕道乱山子以北,究竟为何时开始改道东移,史无记载。今据《肃州志·柳河册》“效谷县”条下云:“效谷废县,在肃州西(今安西卫西)汉置,属敦煌郡。”桑钦曰:“县本鱼泽障也。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为鱼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故名。”又据《汉史》,西汉衰帝时,有尚书令唐林,为马昭仪冤死案,司隶校尉孙宝上书被执系狱,唐林上书力争,也被贬为敦煌鱼泽障候障。大约汉哀帝时鱼泽尚存在。又《晋书·李嵩传》:“北凉段业以李嵩为效谷令,有惠改。”史书自魏晋之后,只言效谷县,而不提鱼泽。估计鱼泽自东汉时期已开始有干涸之象,附近之地逐渐被人们开垦为田,李嵩为效谷令时,可能鱼泽已无蓄水,仅有河道,大部变为民垦区域,典籍未能评言其事。鱼泽的干涸,意味着黑水河的改道东移,以前的故河道遂变为纯季节河而渐

次干涸。大约自吐蕃攻陷瓜州后河道断流,这是瓜州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黑水河的地下潜流却在锁阳城东北9公里的地方溢出地面,形成无数沼泽、泉流、芦荡、苇池,连绵不断,遂使黑水河、黑水桥的名字仍能一脉相传,保留至今。下游河床虽已变成盐碱草原,但其涓涓泉流长流不息,仍然保持着故河道的形貌,而流入沙漠。

(三)锁阳城的历史辨析

已知锁阳城东北的古河床为《禹贡》中的黑水河,亦即汉、晋时期的冥水。按《汉书·地理志》冥水在安县,县以水得名。今锁阳城坐落于黑水河南岸,地形位置与《汉书》冥安县大略符合,除此城外,别无他城与之比拟,足证为汉之冥安县地,似无大谬。又据《晋书·地志》,元康五年(295),曹魏分酒泉之沙头,与敦煌之渊泉、冥安、会稽、新乡等八县归晋昌郡,晋昌郡治所在冥安。《唐书》记载,武德五年(622),改晋昌为瓜州,直至开元,均称瓜州,天宝元年(742),又改瓜州为晋昌郡。《元史》亦称:“瓜州,唐改为晋昌郡,复为瓜州。宋初,西夏,夏亡,州废,至元十四年复立为瓜州,二十七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

由以上三条已见锁阳城之历史梗概,汉为敦煌郡所属之冥安县,晋为晋昌郡,唐为瓜州。唐玄宗时,吐蕃反,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因击败吐蕃,修复城池,收合流民,重归旧业,以功进为瓜州都督,升瓜州为都督府。至宋天圣八年(1030),西夏李元昊攻肃州,“瓜州吐蕃王率千骑投元昊”(见《肃州志》)。

(四)瓜州与苦峪城辨析

《明史·列传·二百十八》:“沙州卫,自赤金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按《肃州志》,元、明之世,蒙古人称锁阳城一带为上达尔兔,称玉门镇、三道沟、布隆吉一带为下达尔兔,汉译为“苦峪”之意,故明代亦称锁阳城为上苦峪城。到了清代又称玉门镇(靖逆)为下苦峪城,但在明弘治、正统中,吐鲁番侵哈密,流民内徙。正统六年(1441),于关外新筑苦峪城,以安置流民。今据《肃州志》柳沟册内载:“苦峪城,在废瓜州东,至肃州四百里。”说明锁阳城为古瓜州,并非明代所筑。而明所筑之苦峪新城在废瓜州以东,东至肃州四百里,据此数,则苦峪城位置应在布隆吉西南。今实地察得在瓜州东北戈壁滩中有一小城,当地人称之为“半个城”,西距瓜州约17公里,正北距双塔堡16公里,东距肃州200公里,正合400里,疑即明正统中所筑之苦峪新城。清代《柳沟志》编纂者在“上苦峪城”条下误将唐代瓜州古城指为明正统中所筑之苦峪城,遂使后世学者新旧混淆,眉目不清,忽略了“苦峪在废瓜州之东,至肃州四百里”的事实。